

西班牙内战的安那祺主义教训



赵京 编著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 S-1



中日美
日米中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ntana
del S.D.P.

印刷: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stown, NC

27560 USA

出版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zhao.cpri@gmail.com

第五版, 2025年4月17日

字/词数: 26千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17055-5



目 录

前言

一、研究（赵京著）

1.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 … 1
2.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 … 5
3. 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 …12
4. 西班牙安那祺运动的历史经验 …23

二、文献编译

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纲领 …34
2. 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纲领 …36
3. 乔治·奥威尔著《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摘录） …39

前言（第6版）

中文世界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奋斗的了解至今还主要来自巴金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就收有：

[1] 西班牙的斗争（若克尔）（1937年10月旧金山平社初版，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改订五版）；

[2] 战士杜鲁底（1938年8月上海平明书店初版）：布埃那文士拉·杜鲁底的生平（H. 吕狄格尔），纪念杜鲁底同志（F. 孟蔡尼），杜鲁底并没有死（爱玛·高德曼），我和杜鲁底的第一次会见（奥古斯丁·苏席），杜鲁底纵队（卡尔·爱因斯坦）；



[3] 西班牙（苏席）（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西班牙进入一九三八年，加米洛·柏尔奈利；

[4] 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米宁）（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附录 送别国际队的志愿兵（F. 孟蔡尼）；

[5] 西班牙的日记（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加尔洛·罗塞利，西班牙的日记；

[6] 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罗塞利）（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之后版《巴金全集》第17卷还有“《西班牙在前进中》后记”、“《西班牙的血》序”等。

中国著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翻译了斐列克斯·莫罗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其中介绍安那祺主义的传奇英雄杜鲁底

对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记者发表的一篇有名谈话，代表了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心声，值得引用：“对我们说来，这是要一劳永逸地扑灭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管我们这里还有政府存在。”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消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我不期待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革命会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获得援助。各个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也许会对我们的斗争发生某种影响。这是很可能的。佛朗可正在尽其所能把欧洲拖入冲突中。他会毫不迟疑地教德国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不期望什么援助，最后分析起来，我们甚至不期望我们自己的政府给我们帮助。”

第一部分收入的四文，在不同时期写成，内容有少许重叠，反映了我对相同关注的思考程度。另有一篇相关文章“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因为与第一国际关系更深，被编入《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第四版，2014年12月27日，ISBN:978-0-557-01635-8）。

第二部分的文献1、2引自

<http://bbs.bhsf.cn/dispbbs.asp?boardID=57&ID=3807&page=1>。其中有说明：“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国对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文献译介较少，且多站在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西班牙共产党的立场上，而西班牙内战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西班牙左翼工人政党的宣言、分析、传单等文献难以见到。为了更好理解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现将两篇文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纲领》和《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纲领》译出，译文依据《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杂志第1卷第2期（1988年出版）发表的英译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当时西班牙较有力量的政党。…… 注释均为中译者注”。2007年2月1日。

赵京，2025年4月17日

1.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

2004 至 05 年期间，我受邀为西班牙当代史协会编辑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专集，与 Revista de Historia Actual（当代历史评述）在西班牙 Cadiz 大学的编辑们有一些交流。其中负责网上出版技术的 Rafael Gomez 非常纳闷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容忍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终身统治西班牙直到 1975 年 11 月 20 日死亡。对我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与日本的天皇一样，佛朗哥看透西方“民主”阵营战后需要他铁腕统治西班牙以对抗他的宿敌苏联。正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样，佛朗哥获得德、意法西斯的军援，但共和国却从英法那里得到“不干涉内政”的保证。1976 年，佛朗哥的残党在得到“不追究犯罪责任”的保证下还政于民，也算是聪明识时务，被亨廷顿声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开始。

Cadiz 位于西班牙的西南海岸，面对大西洋，邻近摩洛哥，在内战爆发（从 1936 年 7 月 17 日）时属于叛乱地域。离 Cadiz 约 100 公里以北的内陆城市 Seville 在内战爆发时也属于叛乱地区。在 Cadiz 和 Seville 之间的山区，有一个叫 Casas Viejas（卡莎维哈斯）的小村庄，在这里发生了安那祺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卡莎维哈斯屠杀”事件。Rafael 告诉我，他奶奶就住在卡莎维哈斯。

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根源来自于对天主教和王权的残酷支配历史的反抗，当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激励起民众的共和理想时，拿破仑的刺刀却架在西班牙民众的头上。这也是西班牙产生了最早（在蒲鲁东等作出理论总结之前）、伟大的安那祺主义艺术家 Goya y Lucientes (1746-1828) 的原因（插图为其著名的油画 The Third of May, 1808）。西班牙是安那祺主义发展成一种主要政



治运动的惟一国家¹，而卡莎维哈斯被广泛认为是安那祺主义运动乡村起义的典型。自 20 世纪初安那祺主义哲学在欧洲传播并在其边缘地区（俄罗斯和西班牙）发展成长，那些刚刚形成的大都市中的“无产阶级”穷人阶层最容易受到安那祺主义的激励，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被初步组织起来的工会自然成为安那祺主义的主要力量。1933 年，刚成为共和体制的西班牙仍然处于专制势力（特别是军队）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刚踏上政治舞台的都市劳工和村镇民众又不可忍耐地诉诸政治手段要求改善经济待遇。1 月 8 日巴塞罗那、马德里和 Valencia 等地的安那祺主义者在匆忙之中响应传闻中的铁道工人罢工而起义，认为可以一举摧毁旧制度，遭到政府的轻易击破，但在卡莎维哈斯，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村民却于三天后袭击警察局，宣布实现自由共产主义。

此时，以 Azana 首相为首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并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对于各地的来自专制势力和自由共和/安那祺主义的反叛，只能下令镇压，却随各地的警察和军队按其意愿执行。当卡莎维哈斯暴动的消息传到城里，一个中士奉命带着十二名警察先被派来赶到村边。



三个小时以后，一个中尉奉命带着十二名士兵和四名警察前来增援镇压。此中尉头一天刚到任，对于本地怀着恐惧不安，本能地感到每一家村民都是叛乱分子。军队和警察们最终在一个烧炭的茅房处遇到武装抵抗，他向省长要求进一步声援，晚上十点时，省长的特使与两名带着手榴弹、来福枪和一挺机枪的下士也赶到了。天色已晚，中尉不想无谓地伤亡，准备第二天天明之后再进攻。此时，另一队载有四十名士兵的车队赶到，这支由一个上尉指挥的军队在出发前一天刚从马德里被调到一个叫 Jerez 的小城去镇压那里的安那祺主义抗议活动，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眠了，上尉曾拒绝来自内务部长的电话命令，

¹安那祺主义成为重要政治运动，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另一个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乌克兰。参见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2011 年，ISBN:978-1-4583-0411-7。



但被迫带着士兵赶夜路到卡莎维哈斯去平息紧急状况。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原准备与成百上千的武装安那祺主义者战斗，现在看到面前的敌人只是躲藏在茅房里的男女老少，杀戒大开，不等天明，立即放火烧燃茅房，并射杀往外逃命的八个安那祺主义者（右插图）。丧失理智的士兵们又报复整个村庄，射杀了另外十二个村民（左插图为部分殉难者），酿造了震惊全西班牙的“卡莎维哈斯惨案”。

与几乎所有的政府犯下的罪行一样，随之而来的是由受到袭击的乡镇警察和参与镇压的政府官兵对每一户村民的审判，不少村民逃离了卡莎维哈斯，留下的人要忍受此后数十年的敌意和仇视，这是西班牙 Andalusia（安达路西亚）地域无地民工愤怒和牺牲的象征。后来，惨案的真相部分地被揭露出来，相关的官员都推卸责任，说自己没有下命令屠杀，最终导致 Azana 政府的辞职。这个惨案加剧了专制势力推翻共和体制的决心，佛朗哥在叛乱的第二天的广播声明中就声称西班牙被安那祺主义和革命罢工摧毁了。在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制作放映的《大丈夫佛朗哥》电影中，就描述卡莎维哈斯起义是促使佛朗哥反叛共和国的决定因素之一。可怜的安达路西亚贫苦民众，你们在共和体制下尚不能得到公正，又如何能在专制独裁（教会加军警）下苟活生存？怪不得那些在佛朗哥死后采访该地的外国人都发现：安达路西亚山民最会撒谎，因为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本能了。

卡莎维哈斯见证了安那祺主义运动的真髓：希望、叛乱、失败；再希望、再叛乱、再失败……而在这一系列看似循环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制度、人类的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共和体制在西班牙已经稳固，就是因为西班牙经历了卡莎维哈斯惨案、西班牙内战，特别是佛朗哥独裁反动时期。

如果说安那祺主义政治实践与别的政治力量（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多数派别）有什么重要区别的话，那就是：安那祺主义为了改进社会，常常不回避明显的政治失败。正如西班牙内战的参与者舒奇回

顾到：我们这些安那祺主义者遭受各种政府权力的迫害，一生都处于监禁、流放之中，好像一事无成。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许多我们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国度的宪法条文中，政府的权力进一步被制约。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随处可见安那祺主义理想里闪耀着芝加哥干草市场、墨西哥萨巴提斯塔、俄罗斯克朗斯达特以及西班牙卡莎维哈斯殉道烈士们的光芒。

此文主要参照 Jerome Mintz,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也从 Helen Graham, *The Spanish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和 Robert Graham, *Anarch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Vol. 1. Black Rose Books, 2005 中得到一些知识。

[2007年1月1日 美国圣拉蒙]

2.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

虽然安那祺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地域，但只有在西班牙才成为真正的大众社会运动。在 1936-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安那祺主义又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提供了作为实践的安那祺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起源于 1868 年巴枯宁派遣来的使徒。与俄罗斯类似，西班牙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遭受国王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阀、警察、匪徒联合体的统治。在 1873 年的 Cordova 议会后，国王 Amadeo 放弃王位并逃离西班牙。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西班牙于 6 月 1 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并选出 Pi y Margall 成为总统。出身中下层的 Margall 深受蒲鲁东的影响，著书质疑权力的来源：“任何对别人行使权力的人都是暴徒”，“真正的秩序不能靠强制获得”。虽然 Margall 在从政过程中修正了他的安那祺主义观点，“至今任然被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视为圣者”²。Margall 的共和政府很快瓦解，但联邦/联盟 federal 和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在 1936 年，拥有百万成员的西班牙最有影响的工会 CNT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也只有一个专职的书记领薪水。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两个地域最成功扎根民众：最贫困的安达路西亚 Andalusia 山区³和最工业化的卡塔罗尼亚 Catalonia (以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巴塞罗那为中心，在内战之前成为自治体，有“总统”)。CNT 和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联盟 FAI (Iberian Anarchist

²引自 Gerald Brenan, *Anarchism in Spain*.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371 页。这一段历史简介多来自此书。

³见笔者前文“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比较政策评论第 11 期 2007 年。

Federation) 的成员多数也来自安达路西亚⁴。1931 年西班牙再度宣布共和, 经过几度选举变更后, 社会主义派、共产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一些地方主义派加上安那祺主义 (CNT-FAI)、托洛茨基派 (POUM) 和一般共和主义派的支持, 组成的联合阵线在 1936 年以 34% 比 33% 战胜执政联盟⁵, 旧势力在共和西班牙内已经无法靠普选回复失去的政权。经过一系列小规模暴力事件后, 在摩洛哥殖民地等处的军队开始发动叛乱, 引发了内战。

西班牙内战以法西斯势力得胜告终并使西班牙处于佛朗哥将军的专制统制下四十年。独裁者佛朗哥死后, 恢复共和的西班牙不得不妥协, 保证不追究佛朗哥党徒的罪行。所以, 对内战的研究在西班牙本身就不充分⁶, 更不用提在西班牙语之外的世界了。在英语世界里, 在哈佛大学任哲学教授的 Santayana 可谓是西班牙最出名的知识分子⁷, 但他的保守主义支持佛朗哥 (同时也追随美、英的“反共”外交政策), 由此可以想象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研究的贫乏。除了舒奇等安那祺主义参与者的相关回顾⁸外, 原共产国际的奥地利成员 Borkenau 的《西班牙座舱》⁹和著名自由主义作家奥威尔的《向卡特

⁴例如, 1882 年在 Seville 召开的安那祺地域联盟会议, 代表的近 5 万成员中, 有 3 万来自安达路西亚, 1 万 3 千来自卡特罗尼亚。引自 Gerald Brenan, *Anarchism in Spain*.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382 页注 13。

⁵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anish_Civil_War。

⁶许多内战后逃到墨西哥等西班牙语国度的共和派人士发表或出版了不少回顾, 他们多少促进了南美学术圈的激进化。曾在墨西哥大学留学的 Hobbs 律师告诉我, 他的人文科教授们几乎都是马克思信徒。

⁷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antayana/>。他虽然只在西班牙生活 8 年 (另 80 年在波士顿和罗马), 却一直保持西班牙的国籍。

⁸见笔者“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与思考”, 比较政策评论第 7 期 2003 年 <http://cpr1.tripod.com/cpr2003/souchy.html>。收入本文库赵京《德意志观念对安那祺主义的贡献》, ISBN: 978-1-257-37771-8。

⁹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罗尼亚致敬》¹⁰有亲身的记述。Borkenau 后来成为反共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减少他 1937 年就出版的报道的价值，其中涉及许多安那祺主义实践的难题。

一、“1936 年 8 月 5 日晚 11 点，巴塞罗那：除了中央大教堂 Cathedral，所有的教会都被烧毁了。那些教堂的墙还没有垮，但内部已经被完全毁掉了。有一些教会还在燃烧。交通中心附近的意大利蒸汽船公司的大楼也被烧毁了，据说因为有人从那里放冷枪。不过，除此之外，并没有纵火。刚击败军事叛乱时，有人借安那祺之名抢劫，也有旧军人在烧毁教堂时盗走财物。CNT 立即发布公告，这在各建筑物墙上随处可见，对抢劫者现场格杀勿论。实际上，安那祺主义者对于所有教堂财物，包括银行支票，都统统付之火炬，比一般共和主义分子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清白。在回旅馆的路上，我看到一个教会的烧毁，非常吃惊。我先以为是一帮为非作歹之徒所为，其实是执行公务。火焰迅猛，有一小批人在旁观看，既不惋惜也没有兴奋。消防队的人也在场，防止火焰延到附近的建筑物，也防止有人进入教会。人们对此都变得麻木、顺从了。”¹¹



这个安那祺主义与教会关系的目击记实，发生在西班牙刚废除王制的几年内，实际上把教会完全推向叛乱的佛朗哥一边，成为共和政府垮台的致命因素之一（插图是共和主义分子向耶稣塑像开火）。而包括梵蒂冈在内的天主教会对于佛朗哥支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佛朗哥战胜后把西班牙的教育权给教会。西班牙（包括今天的葡萄牙）教会在十

¹⁰ George Orwell, *Homage to Catalonia*, London, 1938.

¹¹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 493-494 页。

一、十二世纪以来以修道院朝拜起家，积累了大量财富¹²，与王权结合，实施“异端裁判”等等，罪行深重，对其惩罚是不可回避的，但烧毁教堂是不可取的。巴黎公社把教堂开放给社区公用，列宁也没有烧毁教堂，而是没收其财物拿到国际市场上去换取急需的食物、药品等。实际上，以安达路西亚山民为主的广大安那祺主义拥护者，在心灵深处，同时埋藏着对代表公正的千年王国的盼望，烧毁教堂的不文明行为，把多数没有文化的山民也推向叛乱势力。

这使我联想到 2004 年 11 月，年过八旬的墨西哥南部的贫穷省恰巴斯 Chiapas 原主教 Ruiz 访问加州，我们参与接待了他，与他有过短暂的交谈。他在主教任职期间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¹³。墨西哥政府连续三年迫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放弃授奖给 Ruiz，声称那对墨西哥是耻辱的，并威胁如果 Ruiz 获奖，将撤毁对原住民的承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西班牙语世界中天主教的不可替代的功能。¹⁴

二、“8 月 6 日：到处是代表各政党和工会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如 1934 年的奥地利那样）由各工厂直接选出的苏维埃呢？CNT 有能力决定是否建立苏维埃，如果 CNT 愿意，社会主义党 UGT 等无法阻止。我意识到 CNT 已经通过强大的工会组织控制了工厂，如果举行苏维埃选举，只会让别的政党也到工厂去（试图）分享

¹²其修道院或教会的艺术建筑本身也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例如最广泛使用的英文教材 Marilyn Stokstad, *Art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5 第 523、526 页。

¹³参见笔者译文“战争状态下的恰巴斯”，《十月评论》1998 年第 4 期。
<http://cpri.tripod.com/cpr1998/chiapas.html>。收入赵京《美国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ISBN: 978-1-257-43927-0。

¹⁴我 2004 年圣诞节期间访问墨西哥城，也感受到民众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见我的“墨西哥之旅随感”<http://cpri.tripod.com/cpr2004/mexico.pdf>。

力量。其实，在俄罗斯，共产党人在通过政党掌握权力后也对苏维埃不感兴趣了。”¹⁵

“8月8日：安那祺分子的暴力不限于它的敌人，昨天它也攻击POUM（托洛茨基派）。当POUM的军事组织带枪召开一个常规的会议时，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乘卡车赶到，在会场门口架上机枪，解除了POUM的武装，宣布在此地没有必要让POUM从军事上威胁CNT的支配地位。POUM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¹⁶

不过，在军事这个权力行使的实质问题上，很难只责难安那祺主义者。实际上，由于苏联是共和政府的唯一实力支持国（提供包括飞机等重武器），到处都流传着“俄国人做主”的说法。俄国人顾问不到两千，但控制重要的位置（例如巴塞罗那电台、武器生产部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通过NKVD（苏联秘密警察）先把托洛茨基派赶出去，再下一步，在12月12日的《真理报》宣称：“在卡塔尔尼亚，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安那祺分子的行动已经开始，并将以在苏联同样的能量展开。”更可悲的是，当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头目自以为是“西班牙的列宁”时，俄国人认为他们不如外国去的共产党人可靠，由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秘密行事的苏联警察（其头目、驻西班牙大使Rosenberg本人其实也不被莫斯科信任）操纵的共和联合政府，怎么可能与西班牙职业军队作战？

此外，如何组织军队，也对安那祺主义提出挑战。佛朗哥发动叛乱的一个原因就是共和政府宣布废除常备军，断送了佛朗哥及其

¹⁵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497-498页。

¹⁶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508页。

手下的职业军人的前途¹⁷。面对这样的职业军事叛乱集团，共和政府在是否创建职业军队以及由谁指挥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回顾起来，西班牙内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势力的德国、意大利马上支援佛郎哥（插图为毕加索著名的德国1937年轰炸格尔尼卡壁画），但英、法等“自由民主主义”国



度则采取“不干涉”的观望态度（法国的社会党政府在最初曾支持过但很快放弃了），而支持共和政府的苏联（以及墨西哥）力量不足，又带有狭隘的“保卫苏联”的政治意图瞎指挥。与巴黎公社的命运一样，西班牙共和的命运也难以有不同的结果。除了共和政府内部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不合作（未能建立广泛的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组织与资产阶级共和政党之间的对立（未能组建有效的军队等），暴力销毁教会等教训外，还有不成熟的实验（如农业合作化、废除货币的交换等）。尽管如此，短暂生存的战时共和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¹⁸。兴许，共和西班牙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法制改革试验，正如安那祺主义者法务部长 Oliver 在 1937 年 1 月 3 日演讲的那样：“我们不是要废除法案和律师，但事实上律师太多了。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常时，没有偷窃和杀伤的必要。在西班牙的历史上，让我们首次宣布：一般违法者不是社会的敌人，他更是社会的受

¹⁷ 1973-74 年在西班牙制作的电影《大丈夫佛朗哥》也是这样讲的。其中也提到卡莎维哈斯惨案作为职业军官们叛乱的理由。

¹⁸ 例如，1931 年全西班牙只有 3 万 7 千名教师，但 1937 年新开了近千所学校，在共和西班牙就有 6 万名教师。1937 年，天花等疾病的预防注射在共和西班牙也得到全面推行。见 Hugh Thomas, *Anarchist Labor Federatio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518-519 页。

害者。” “法律是如此敏感的事务，我们只能用人的心去解释它。”

19

这就是安那祺主义的精髓：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遵守、接受的基础上。与所有安那祺主义运动一样，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也由于主客观、国内外的因素没法达成这一理想，更悲烈地演示了希望、崛起、抗争、失败、绝望、再希望的过程。罗莎·卢森堡在近一个世纪前对“如果社会主义错了，欧洲不需要社会主义”的疑问，回答道：“那就意味着野蛮倒退。”现在，我们同样面临着文明还是野蛮的选择。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腐败的国家权力与欺诈的跨国界资本勾结，支配全球时，也只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制约，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安那祺主义的理想。

[2008年9月28日 美国圣拉蒙]

¹⁹Hugh Thomas, *Anarchist Labor Federatio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520 页。

3. 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

在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实践中，1971年巴黎公社的悲剧是主要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体雏形在外来（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压力下被资产阶级“共和”派（主要特征是由“普选”产生的政府）镇压的历史²⁰，半个世纪后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主要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俄国革命的精髓对于正在形成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反抗²¹，而持续了将近3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的西班牙内战则是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和新起的共产党又合作又被出卖（内战中的内战）的过程中，被以佛朗哥为首的旧军队、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会和保皇党势力联合的血腥法西斯军事独裁击败和报复的悲剧。

关于西班牙内战，当时就有大量各种媒体文献出现，有一千多位记者从世界各国赶去报道战事，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等正义人士直接到西班牙参加来自五十多国有四、五万之众的“国际纵队”（插图是1937年阿拉贡Belchite战役中的国际纵队坦克）



²²，他们写出的文学作品《战地钟声》、社会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等脍炙人口。法国作家阿伯特·卡缪、智利诗人（当时任驻西班牙

²⁰ 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年11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paris.pdf>。

²¹ 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978-1-4583-0411-7，2011年1月。

²²国际纵队虽然被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但绝大多数战士们，都是自发自愿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人类前途的正义事业，属于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理想主义者。

牙大使) 聂鲁达等的作品也震撼人心, 最著名的当然是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控诉德国法西斯轰炸不设防的巴斯克城市的大型壁画《格尔尼卡》。在弗朗哥死后, 西班牙虽然政治上妥协不对残留的法西斯势力清算, 但对内战研究解禁, 受害者们纷纷站出来控诉, 埋藏了几十年的大量史料(包括屠杀场所)暴露在公众面前, 震撼了国际社会。除了西班牙语、加泰罗语, 英文、法文等资料也层出不穷。每一本试图全面描写西班牙内战的书都必须用专门一章的篇幅来讲资料来源, 特别要提及新的研究发现, 同时也不得不对既有的文献进行评判。不用说, 这是西班牙内战在新的形式(历史叙事)下的继续展开。²³

在中文世界里, 除了我已经发表的两篇论文, 巴金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译文依然是最有价值的文献²⁴。虽然在近三年的悲壮斗争中, 有许多珍贵的成就(如集体农作²⁵), 正如意大利安那祺主义女作家 Marie Louise Berneri 所说: “我确信, 如果只是盲目地歌颂而不坦

²³ 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对西方自由派学者关于西班牙内战研究的偏见进行过检验。不过, 他的语言学“大师”、MIT 终身教授的身份也避免不了主观见解。当然, 只要依据史实, 各种观点都值得参考。我很奇怪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3 卷 35 册, ISBN 7-80149-634-5/K.08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余万字中没有收入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资料, 可能是因为西班牙对斯大林并不重要的原因。但苏联毕竟是弗朗哥的唯一终身敌国。

²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 8 卷, 收入本书第二部分。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 2007 年) 虽然没有深入讨论西班牙内战, 但文笔生动, 也参照了最近的英文史料, 值得向不熟悉西班牙历史的中文读者推荐。

²⁵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主要引用 Gerald Brenan, *The Spanish Labyrinth*, Cambridge, 1943 和 Gaston Level,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Spain*, London, 1938, 用一章(第 9 章)的篇幅介绍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在阿拉贡, 75% 的小农自愿加入新的集体化秩序, 不愿加入的也得到尊敬, 顺其自然。” p. 100. “平均收成增加了 30%”, “在近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安那祺主义‘各取所需’的原则” p. 101. “这是朴素人民的自发愿望, 他们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 以创新的精神和公正的态度顽强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西班牙劳工阶级显示了比欧洲任何国家的人民都突出的自发合作才干” p. 103. 本文的基本分析多借助于此书。

率地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的运动将会更快败坏衰退下去。”²⁶本文的目的是从安那祺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西班牙革命悲剧的教训。

[为别人做嫁妆的选举]

1873年，西班牙成立第一共和，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恢复了军人专政下的“君主立宪”。1931年，西班牙实行第二次共和（插图



庆祝集会）。共和政府着手广泛变革（包括言论、集会的自由，女性选举和离婚的权利），裁减臃肿的军队、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教育改革（取消政府一贯给予教会的办学特权）、容许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等。这激起军人阶层、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和保皇派等右翼旧势力的反对。他们打出了“财产、信仰、统一祖国”的口号，在1932年8月举行暴动，被政府镇压；但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无法实施，南部安达卢西亚最贫困的安那祺主义农民1933年1月宣布成立共产主义公社，也遭政府镇压²⁷。在1933年的大选中，左翼联合阵线瓦解，让右翼联盟夺回政权。右翼政府取消各种改革政策、大肆逮捕罢工工人，更加激起社会动荡。

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包括强大的全国劳工同盟CNT（数百万成员）和伊比利亚安那祺主义联盟FAI（FAI全员加入CNT并成为其核心，两者常常被相提并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主义政党、受苏联控制的小党西班牙共产党PCE（成员不到3千人）、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工人党POUM（成员数百

²⁶ Vernon Richards (Berneri的丈夫),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扉页。Berneri和她的父母亲Camillo、Giovanna都因为反抗墨索里尼1926年被迫流亡出意大利。Camillo Berneri投身西班牙革命，1937年被共产党暗杀。

²⁷ 赵京“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沙维哈斯惨案”（前文）。

名)、受西班牙社会党影响的工人总联盟 UGT (与 CNT 旗鼓相当)、以及资产阶级共和派左翼等组成的“人民阵线”²⁸, 获得总数 925 万选票中的 475 万票微弱多数 (在国会获得 267 个席位, 远多于右翼联盟的 132 席), 得以组织政府²⁹。

CNT 的领导层当然有现实理由 (如为了释放政治犯) 放弃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参加政治选举, 但他们完全没有基本政治智慧保护自己的运动。且不说国际上英美等“民主国家”为了资本的利己不会反对西班牙的资本阶级和教会³⁰, 国内失掉特权的现役、退伍军人阶层一定会再次叛乱, 而且会组织得一次比一次周全, 但除了 CNT, 没有别的全国性力量可以动员、并有决心准备抵抗军事叛乱。如果 CNT 不参与选举的政治游戏, 右翼会得到多数选票继续执政, 但在军人阶层没有借口政变的情况下, 右翼也不能维持统一, 推不出一个首领。这种动荡的政局维持下去, 等到欧洲 (世界) 大战爆发, 西班牙共和派就不会孤军作战了。³¹

²⁸ 这是在苏联-共产国际控制下的西班牙共产党的策略。弱小的共产党先通过“合作”, 控制了社会党的青年组织。

²⁹ 新华社的“西班牙内战”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1/content_2859039.htm的“历史背景”中介绍: “1936年1月, 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党、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同盟等民主力量组成人民阵线, 2月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组成联合政府, 实行民主改革。”完全不提最多成员的安那祺主义组织。

³⁰ 尽管英国的大多数民众同情西班牙共和, 但控制直布罗陀和葡萄牙的英国商人阶层和内阁官员都与西班牙资本阶级利益密切。法国在内战开始时以飞机援助共和国, 但得到英国“如果法国因为支持西班牙共和而与德意冲突的话, 英国不会支援法国”的立场, 很快就与英国一同采取德、意完全不理睬的武器禁运。美国从 1931 年一开始就对新兴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予以敌视。当内战爆发后, 美国政府禁止对西班牙政府的一切武器运售, 持“中立政策”, 但得克萨斯石油提供 350 万吨汽油的销售和无限期贷款、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提供 12,000 辆卡车、杜邦公司贩卖许多弹药给佛朗哥 (数据引自维基百科)。只有墨西哥政府公开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 提供数量有限的军备, 后来也接受了大批难民。

³¹ 这个观点来自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23, p. 29.

1932年的共和政府挫败过8月10日的准备得不算充分的军人叛乱，但这次1936年的叛乱策划长久，而共和政府完全没有对付叛乱的准备。6月12日，当时的总理Casares接到Yague上校在摩洛哥密谋叛乱的情报后召见Yague，要把他调回西班牙本土或派驻海外。Yague表示效忠共和，说他宁愿烧掉它的军服也不会离开部下，轻易骗取Casares的信任，回到摩洛哥继续密谋叛乱。三天以后，Casares又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当Navarre州长接到Estella市长关于摩拉将军密谋的报告，命令武装警察civil guards把摩拉的住宅包围起来。但Casares接到报告后却命令州长撤离警察：“摩拉将军是忠诚的共和派，值得政府的尊敬”。更不可思议的是：6月23日，Casares接到袁世凯式的人物佛朗哥将军的密信，说只要任命他管理，就可以保证军队不会出事。这说明奸猾的佛朗哥脚踏两只船还在犹豫，而共和政府此时应该立即逮捕佛朗哥，实在不行拉拢佛朗哥也好（他那时在Canary岛上学习高尔夫和英语，并不是叛乱的密谋核心）。但Casares什么也没有行动³²。7月17日，摩拉和佛朗哥宣布接手政权，武装叛乱开始了。但共和政府刚开始不相信军队真会叛乱，马上要把战争部长的位子让给摩拉！共和派的民众前往马德里政府中心要求得到武器，抵抗叛军，但Casares害怕武装的民众比害怕叛军更甚！安那祺主义运动就这样被其领导层愚蠢地为这样昏庸的政府做嫁妆。

[放弃社会革命的代价]

幸好军队的部分军官和多数士兵（特别是控制海峡、港口的海军全部）拥护共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政府如此无能，以安那祺主义者为主体的平民能够自发地迅速在人口集中的2/3的地区平息叛乱的原因。发起军事叛乱的军官，首先要煽动起杀人的仇恨（普通西班牙士兵刚开始只是跟着起哄），但最初只在摩拉对要求分离的巴斯克人和佛朗哥指挥下的摩尔人对西班牙平民的屠杀中获得成功。在德国海军

³² Preston, 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action, Revolution, and Reveng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7. pp.95-97.

援助下得以把摩洛哥军团运到西班牙本土的叛军仅控制南方贫瘠的安达卢西亚和北方的几个经济落后省份。共和政府除了国际正统性（尽管没有实际利用价值），还拥有占世界第二的国家金银储备（五百吨黄金），也控制着首都马德里、最大的都市巴塞罗那和主要的工业区巴斯克的钢铁与军工厂，以及主要港口、交通干线和重要经济作物产地，拥有更大的胜算。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是：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政府不存在了！

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在牺牲原则为别人做嫁妆的后，面临着历史性的社会革命机会。特别在安那祺主义的大本营巴塞罗那，法西斯叛乱当天就被轻易击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实际上垮台了。第二天，当 CNT 领导人 Santilan 和 Oliver 挎枪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大厅时，加泰罗尼亚左翼民族党的光杆“总统” Companys 显得非常诚实：“首先，我必须说你们 CNT 和 FAI 从来没有得到按其重要性应该得到的待遇。你们总是受到迫害。我很对不起你们。我过去同情你们，上台后却不得不反对和迫害你们。今天，你们击败了法西斯军人，你们是这个巴塞罗那城市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主人。我希望你们接受我们忠诚的党员、卫队和民兵的帮助。……你们已经胜利，所有的都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需要我这个加泰罗尼亚总统，现在就告诉我。我会成为你们的一员士兵，与法西斯战斗到底。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觉得我作为加泰罗尼亚总统，在西班牙的别的地方前途不明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战斗，请相信我作为一个人和政治家的忠诚。我今天相信，过去的耻辱已经死掉，加泰罗尼亚应该把自己置于最进步的社会事业的国家的前列”³³。这正是实行社会革命、解散军队、警察等政府机构的最好时机，把所有政治家也编入民兵，共同抗击法西斯。

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诚实的政治家 Companys 后来会因为巴塞罗那电话大楼的 CNT 话务员“监听”他与马德里政府的通话而与共产

³³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p. 33-34.

党联手，命令手下警察武力接管电话大楼！³⁴但在当时，大敌当前，Santilan 和 Oliver 不仅挽留 Companys 继续当总统、还把 CNT 服从 Companys 支配，Santilan 本人更“应邀”加入 Companys 的政府！更不用提 Oliver 后来还与另外三名同志加入几经易手后由“西班牙的列宁”Largo Caballero³⁵组阁的政府！更重要的是，CNT 的领导层为此不得不完全放弃罢工等社会革命手段，避免“反对自己的政府”、“为佛朗哥开放战线”³⁶。Vernon Richards 总结道：“如果说 1936 年 7 月 19 日是西班牙革命劳工在被压迫民众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谱写历史篇章的一天，1936 年 7 月 20 日就是劳工们被自己的代表开始出卖的第一天”。³⁷

实际上，在叛乱刚起的头几个月，有可能粉碎叛乱的，但 CNT 以外的各派却忙于瓜分政府权力，³⁸失去了历史机会。所有四个安那祺主义“西班牙大臣”都留下过在政府当官的回顾。诚实的卫生部长

³⁴ 这成了 1937 年“五月悲剧”的前兆。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第 12 章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巴金也有译文“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罗塞利），1939 年 4 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更有详细的记叙。不过，要为贡巴尼斯说句公道话：贡巴尼斯逃到法国，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逮捕了贡巴尼斯，将其交给了佛朗哥。佛朗哥以军事法庭名义，于 1940 年 10 月 15 日，就在巴塞罗那市区的山顶要塞里，枪决了贡巴尼斯。林达：“西班牙是怎样解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1/07/201107251439.shtml>

³⁵ 社会党人，1936 年 9 月任总理。《真理报》给他这个称号，是因为弱小的西班牙共产党需要通过“联合战线”拉拢强大的西班牙社会党。1937 年 5 月，当西班牙共产党足够强硬时，就把不听话的 Largo Caballero 拉下台。西班牙只有一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列宁”：佛朗哥。

³⁶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58.

³⁷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35.

³⁸ 例如，政府不肯把后方的 6 万条枪发给在阿拉贡前线的以 CNT 为主的战士们。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78.

Montseny 承认是个失败³⁹，司法部长 Oliver 却沾沾自喜他的成就。他对政府的那么多死刑的执行，对共产党的暗杀，抗议过吗？其实，他要是知道资本主义英国的 Howard 刑法改革联盟等工作，就会闭嘴了。倒是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的 Santilan 一年后坦率地承认：“我们不比别的任何官员好。事实证明我们进入政府只加剧了政府权能，根本没有改善劳工的经济、政治权利。”“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如果我们站在人民一边，就不可能站在人民的敌人-政府一边。我们现在是政府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反对人民”⁴⁰。“所谓‘工人国家’只是革命的终结和新奴隶政治的开始”⁴¹。在“五月悲剧”中，这些大臣们站在政府一边，被派往巴塞罗那，传达了“赢得热泪但不是服从的演讲杰作”，叫人民放弃抵抗。⁴²Montseny 最后总结道：“我们 CNT-FAI 绝对单纯，不是搞政治的材料”。⁴³

写到这里，我更沉痛反省 22 年前自己在日本组织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类似政治经历。在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攻占中国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到 6 月 8 日邓小平公开露面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级以上军官的历史时期，中国没有统治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已经失去了自由，台面上的李鹏、杨尚昆无能无德控制政府官僚）。我因为 1987-88 年“雁鸣”事件⁴⁴受到迫害，赢得

³⁹ 她开初拒绝进入政府，最后征求她父亲的意见。老人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放弃安那祺主义。一旦权力在手，你不可能排除权力的罪恶”。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76.

⁴⁰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69.

⁴¹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71.

⁴²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132.

⁴³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143.

⁴⁴ 我作为《雁鸣》杂志总编在 1987 年组织在日留学生政治意识调查，反抗大阪领馆命令公开发行，被香港《争鸣》、台湾《中央日报》转载，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大的政治事件”，连护照也被迫上交。

在日中国同学的信任，组织民主运动。当我们中国留学生6月4日聚集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前时，一个与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特别是驻日大使）都有关系的留学生凑到我的面前。他在前一晚还拒绝我叫他加入游行抗议的电话，说北京还没有“摊牌”，现在要求我任命他当京都的留学生代表。在国已不国的大难当头，我天真地以为政治运动中每个人都有起码的良心，就同意他当京都代表，同时请另外一个同学当神户代表、另外两个同学负责捐款（姚明龙）和公关，我自任大阪代表而不愿当“领袖”。这是我们关西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民主人权运动的悲剧的开端。这个学生奸细马上窜到我们几个人正中的位置，向媒体发表演说，特别在大阪记者俱乐部为我们准备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箭步窜到中间的座位。我当时不断地轻轻拍他的腿，示意他望左靠，使我右边的两个同学也可以坐进来面向记者，同时也提醒他我们几人还要发言。他全然不顾，抓住话筒就不放手。会后，一个中年访问学者马上劝告我不要把这样的学奸引入我们的运动：“我经历了文革，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奸猾的人”。但没有政治经历的我哪里听得进这种“人性恶”的说教，明明看着他一步一步地利用、出卖我们，（例如他的“放弃中国高官”、“要用火与血改造中国”的“日记”也公布给《每日新闻》等发表），从日本政府那里谋到“神户大学法学副教授”的位子，帮助日本政府“保护”了这个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报纸报道为日本政府“保护中国学生”的国际义务事例），反过来为日本政府充当打手，疯狂地迫害我们在日本的中国民众。

在这段近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年代里，我后来连用中文、日文揭露这段沉痛教训的条件也没有了，只能用我的第三语言英文记录下来。这篇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对民主的出卖：天安门的阴影笼罩日本”尽管得到“历史性突破”的有些评审专家赞扬，却找不到英文（更不用提日文或中文）刊物发表，最后由西班牙当代历史协会作为特征文章发表，成为最受欢迎的文章。⁴⁵只有经历了政治上最卑鄙的

⁴⁵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 *Historia Actual On-Line*, 4 (2004). 收入 Jing Zhao, *China and Japan: Research and Review*, ISBN:978-0-557-04795-6. 2009.

人性丑恶的西班牙，才能理解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利益交易，而是为了提升人性的价值！可悲的是，我们在日本被东京、北京、台北、华盛顿等国家权力迫害、出卖的教训，只是整个中国民权运动的缩影！⁴⁶当然，如果我们都有政治“头脑”，人类的历史将会变成各种算计的投机纪录，人性将倒退到“人不是人”的地步，谁还愿意做人呢？

[无视国际革命的机会]

如果说共和政府的其他各派既没有意识到摩洛哥对共和的威胁，也没有摆脱西班牙“帝国”蔑视阿拉伯等殖民地的偏见，具有革命传统的 CNT-FAI 也不例外。共和政府的安那祺主义者卫生大臣 Montseny 甚至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口吻指责佛朗哥“没有西班牙感觉”：“如果他们是西班牙人，是爱国者的话，就不会用摩尔人来推行法西斯制度。被我们殖民的摩尔人不是基督教文明，反过来要殖民我们”。⁴⁷本来，这些安那祺主义的领袖们如果有一点佛朗哥的政治头脑，就应该想到在叛乱刚开始时，立即以西班牙政府的名义，宣布摩洛哥的独立！实际上，在内战初的头几个月里，没有失去人性的西班牙士兵还不习惯对自己的同族（特别是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女）大开杀戒，摩尔人被佛朗哥利用打头阵，被许以各种暴行自由的奖赏，搅动了整个西班牙的仇恨烈火，后来又又被佛朗哥有意识地送死。

[放弃政治独立性的自由]

即使失去了赢得内战的历史时机，安那祺主义者还有较好的机会采取一些独立自主行动，争取较好的结局。佛朗哥在军事上本来可以大为提前结束内战，但他利用已经胜利的战争，要把共和的种子彻底

⁴⁶ 2008年6月日，当这个学奸不再满足日本政权赏给他的“神户大学法学教授”的犹太报酬，甚至要偷窃我们当年几千人的“六四”捐款到清华大学骗取“法学院院长”的职位被暴露后（后实际捞到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的权位），人们才逐渐揭开他披的人皮。

⁴⁷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211.

杀光。这也为共和派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安排后路。例如，应该把国库的五百吨黄金从混乱的马德里运到安那祺主义支配下的巴塞罗那来已备后用，但CNT的头头们害怕搞坏已经互不信任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关系。其实，连共和政府总统也逃到巴塞罗那、政府内阁也迁出马德里到巴伦西亚去了（1938年10月28日又从巴伦西亚迁至巴塞罗那）。在内战已经没有胜利可能的现实条件下，那五百吨黄金决不能“送到苏联保存”⁴⁸，最好能够送到墨西哥以支撑流亡政府，等到大战的爆发；次策是由各共和派瓜分，即公平又安全，可以为上百万共和派流亡提供基本的经济条件，也准备日后政治上“卷土重来”⁴⁹。至少，也可以送给被遣散的几万国际纵队的战士，让他们有条件安顿自己，同时为西班牙共和在全世界作义务宣传。据后来从巴塞罗那到美国留学、任教的Vicente Navarro记载：他到处寻找国际纵队林肯军团的老战士，悲哀地发现他们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反共阴影下不愿提及这段英勇悲壮的历史！⁵⁰

因为只有苏联（带有拖延内战而不是击败法西斯的政治意图）的实质性援助，共和政府（特别是关押包括共和派的监狱）实际上处于苏联秘密警察和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控制下。共产党推行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谋略，为了政治（夺权）目的，坚决反对连社会党也同意的土地国有化等社会革命政策，让天主教影响下的农民没有愿望为共和而战，倒向佛朗哥。当共产党把“西班牙的列宁”也赶下台、又屠杀监狱犯人、滥杀国际纵队义勇军、暗杀具有托洛茨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员（包括其领袖安德烈斯·宁）、1937年5月在

⁴⁸ 据说，斯大林嘲笑说：“就象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西班牙再也别想看到他们的黄金了”。决定运黄金到苏联的共和政府财务部长（后继任总理的）奈格林最后死在流亡地法国时，还念念不忘苏联的黄金借条，保管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希望苏联能够还给西班牙（佛朗哥）政府！

⁴⁹ 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政府倒是有人“流亡”或失踪在法国，直到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后确立共和后，还得“正式”用仪仗队请他回西班牙“取消自治”。

⁵⁰ “The Lincoln Brigade: Some Comments on U.S. History.” Monthly Review Sept. 1986. pp. 29-37. 译文可见倪慧如、邹宁远《橄榄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人间出版社，2001。

加泰罗尼亚施行军事政变挑起内战中的内战、⁵¹连国际纵队也被解散时⁵²，安那祺主义者就应该坚决地退出政府，组织自己的力量实行战略性的撤退（确保港口和通往唯一外国-法国-的陆上通道），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但是，安那祺主义的领导层明知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却被权力腐蚀无法自拔。当共和政府内阁决定抛弃马德里逃到没有国际地位的巴伦西亚时，政府其实也被民众抛弃了。CNT的四个大臣确实抗议过，并表示他们要留在马德里与民众抗战到底，但最终还是舍不得大臣位子。他们逃跑的车队中途被愤怒的安那祺主义指挥官挡住，不得不返回马德里，却又乘飞机逃去巴伦西亚。

在巴塞罗那失陷、共和国总统和内阁都逃到法国的最后日子里，1939年3月5日至6日，本身没有政治野心的中部战线司令卡萨多上校幻想能够在马德里驱逐共产党后可以从佛朗哥得到宽容的投降条件，宣布接管政权，遭到共产党控制的军队的围攻，演出了内战尾声中的又一场内战。安那祺主义指挥官的军队制止了共产党军队的围攻，帮助卡萨多等人逃出马德里，自己等来了佛朗哥的行刑队。

[未完的结论]

佛朗哥征服西班牙后，在英国、美国等政府的扶植下，维持独裁统治到1975年死去为止，但西班牙在他死去两年后再次实现共和。1981年，一小撮军官突袭国会，扣押国会议员们，企图发动政变，只

⁵¹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也记录：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过去，巴塞罗那就同时大乱。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惊讶地发现，“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但 Paul Prest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action, Revolution, and Reveng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7. pp.95-97.) 认为奥威尔的经历有偏见。请参见巴金译的“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罗塞利），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

⁵²1938年9月21日，共和政府解散国际纵队，使外国士兵回到各个国家，幻想英法等国解除武器禁运，并迫使德意撤回军事干涉。

不过是一场闹剧。被佛朗哥一手养大的卡洛斯国王看清历史大势，通过电视转播谴责政变，得到西班牙社会的普遍尊敬。因为今天的西班牙共和已经不可逆转，西班牙民众不允许内战重演⁵³。不仅如此，西班牙议会还通过决议，授予还健在的全体国际纵队战士以西班牙公民的荣誉身份；实现民主的西班牙法庭也传讯到英国治疗的皮诺切特，不允许这个智利的独裁者逍遥法外；因为切身经历了被国际强权（英、美、苏联等）出卖的西班牙深知国际正义的人类价值。安那祺主义也与西班牙民众一道成熟起来，没有去凑选举的热闹，也不再会听任任何试图把安那祺主义运动拿去做政治交易的“领袖”的出卖。

当然，正如那些经历西班牙内战和世界大战、国际冷战等人世沧桑的国际纵队的老战士所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经历了这么惨痛的教训，安那祺主义者还是会做出同样的牺牲选择！说到底，安那祺主义就是捍卫人性、不被各种政府权力利用倒退到兽性和野蛮的社会运动！

当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行省的无名小部落把他们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与两个小偷交给罗马总督处决的时候，谁会想到这成为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今天，我们安那祺主义见证、承受、反抗了人类近代社会误入国家主义以来的愚昧、战争、丑恶、悲惨的未开化的政治秩序，以殉道的精神向人类展示另一条自由、平等、人道的社会形态选择。克鲁包特金说得对：“如果耶稣再生，他只能是一个安那祺主义者”。

以此纪念 22 年前中国英勇悲壮的安那祺主义运动。

[2011 年 6 月 4 日]

⁵³ 由此我们确认，中国的民主自由共和，不在于任何国家首领，而在于我们民众自身。

4. 西班牙安那祺运动的历史经验

Juan Gomez Casas 从小随父辈参加工会活动，15岁时赶上了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民众奋起粉碎叛乱、拯救共和的斗争。内战失败后，他继续坚持地下/流亡抵抗运动，1947年被佛朗哥军事法庭判处30年徒刑，在监狱大学里（实际坐牢15年）对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历史痛切反省。佛朗哥死后，Casas 两度担任西班牙全国劳工同盟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 的书记，由他来介绍、评论西班牙安那祺自由运动的历史是很恰当的，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更有广泛的政治理论价值。这本关于伊比利亚安那祺主义者联盟 Anarchist Federation of Iberia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FAI) 历史的论著被译为英文后⁵⁴，成为西班牙语世界以外唯一了解、思考、反省 FAI 经验教训的较完整记录⁵⁵，在安那祺主义运动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不可多得。

外界习惯把 CNT-FAI 看成一体，因为它们都信奉安那祺主义



（附图的游行和征兵相片上的旗帜都把两者写在一起）。1910年成立的 CNT 作为工会团体，在内战高潮期间达到一百五十万成员规模；FAI 作为意识形态团体，从1927年成立到1939年解

⁵⁴ 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stein. Black Rose Books, 1986.

⁵⁵ CNT-FAI 档案在内战结束时被运到阿姆斯特丹的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作者写作此书时没能利用这些资料（14页）。

体，成员为五千到三万之间。其间，它们的一些更激进的青年成员（包括此书作者 Casas），也作为单独的 Libertarian Youth（自由青年）组织活动。CNT 与 FAI 的关系虽然错中交织，但在 1933 年 1 月的罢工失败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明白：CNT 组织了全国罢工，但在紧急时刻，最关键的部门—铁路工人—没有行动起来。怎么办？以 Ascaso、Durruti 杜鲁底、Garcia Oliver 为中心的 FAI 活动人



士，果断地以 FAI 的名义承担起罢工失败的责任，挽救了 CNT 内部的分裂，减轻了当局对 CNT 的大规模镇压。1936 年 5 月，FAI 解释道：“我们没有计划罢工，我们支持 CNT 计划的罢工。当我们看到 CNT 撤销自己的计划时，我们没有抗议。我们理解工人组织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出现反复，但这种反复不是出卖。”（136-137 页）。实际上，FAI 还没有成立前，以杜鲁底为首的安那祺主义小组在 1922 年 4 月就采取过同样的战术组织 CNT 罢工：如果失败，就由安那祺主义者承担责任。罢工胜利后，宪法得以恢复，CNT 名声大振（63 页）。

我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已经介绍、引用了此书第一章的内容，总结道：“西班牙社会主义在经历屡次政府镇压后反而发展壮大，... 才真正体现了国际的精神，是国际的真正传人。”⁵⁶191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成立的 CNT 除了在精神和成员来源继承国际，也受到近代学校创始人 Francisco Ferrer 的殉难悲剧⁵⁷和法国的工联主义的影

⁵⁶ 2014 年 3 月 3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pain.pdf>

⁵⁷ 西班牙的教育是天主教的垄断专利，他们对于劳工阶级摆脱他们的控制、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又怕又恨，要当局在一天之内审判、处决了 Ferrer（48 页）。

响。虽然安那祺主义和工联主义都来源于法国，但两者在法国是分离的，正是 CNT 的实践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到一年就发展到 3 万成员（51 页），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代表了（第一）国际的精神，提供了不同于第二（社会民主党）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方向。

肤浅的作者容易把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突出贡献和影响与西班牙的（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低级文化程度联系起来，那些响应安那祺主义理想揭竿而起的安达卢西亚文盲山民就是典型的例子⁵⁸。但 Victor Manuel Arbela 的研究表明：1869 年-1923 年期间，安那祺主义者在西班牙出版了 103 种报刊（15 页），说明这是文化宣传的效果。而且，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们在理论上也充分争论过指导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党或共产党领袖们）能够创造⁵⁹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悟）指引革命、改变社会，为什么不能把（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经济规律也改造一下（89 页）？一个全能的先锋队指导下的盲从大众建立的秩序决不是安那祺主义的基于个人自由联合起来的社会 federalism（90 页）。

1926 年，流亡在巴黎的俄国安那祺主义者（包括马赫诺、阿西诺夫⁶⁰）基于俄国革命被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取代的教训，发表了引起广泛争议的“安那祺主义者总同盟纲要” Platform of the General Union of Anarchists，其中倡议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执行机构”（政治局），要求安那祺主义者个人担负“集体责

⁵⁸ 见笔者介绍的“卡莎维哈斯惨案”，2007 年 1 月 1 日。

⁵⁹ 按照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的指示，要靠马克思和他这样的先知来灌输给大众。

⁶⁰ 见笔者《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国际书号：978-1-4583-0411-7）第一章“马赫诺运动”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acr-6.pdf>

任”。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已经拒绝了类似的“危险、含糊”提议（104 页），因为它们违背了自发、自由的基本原则。实践高于理论，不可能为未来制定完全的规划。普鲁东说得对：思想来源于行动，又必须回到行动中去（159 页）。他们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先知先觉”，拒绝了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带来的无尽变种弊端（从斯大林体制到金氏三代王朝）。

经历多年的理论和实践，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流亡在法国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组织 1927 年 7 月 25 日终于在瓦伦西亚举行了历史性的 FAI 成立会议。除了确认安那祺主义的路线纲领外，最令人感动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对葡萄牙代表同志们的情谊：实际负责组织事务的加泰罗尼亚代表团建议由葡萄牙同志们组成第一届秘书处以显示伊比利亚半岛的安那祺主义团结。“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葡萄牙同志们，会场一片寂静。葡萄牙的同志们感动得眼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们指出秘书处应该设在会员多的地区”（115 页）。在才是国际的真正精神！秘书处不是政治局，没有指挥大众的权力。

FAI 成立后，总是与 CNT 全国大会同时举行自己的大会，CNT-FAI 的用法也被人们自然地接受（121 页）。为什么没有人接受“FAI 夺取了 CNT 领导权”这种奇怪的说法呢？因为 CNT 本身“没有中央权力可以夺取。CNT 彻底分权，所有决议和政策都从地方工会开始，达到省、区域和全国的联合会”（9 页）。“需要强调的是：不管代表是不是 FAI 成员，他们代表的决议都是在他们的工会全体成员大会上决定的。在全国大会上决定的事项也要向他们的工会全体成员大会汇报，代表们不可能支持个人的、没有代表资格的决议”（121 页）。实际上，被认为是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灵魂的以 Ascaso、杜鲁底、Oliver 为中心的 Los Silidarios 小组，1931 年出狱后并没有加入 FAI，“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安那祺主义倾向，但总是坚持认为他们的力量在于工会”（122-123 页）。同时，他们在 1931 年 5 月 1

日的国际劳工节游行抗议中，以 CNT-FAI 的红-黑旗帜主导、直接向来压制游行的警察挑战：“为 FAI 让路！”，以备万一遭到镇压时，他们又以 FAI 的身份为 CNT 承担责任（124 页）。从这种意义上说，FAI 可以被称为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者（128 页），一方面被千方百计试图清除工会中的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政府当局污蔑为“持有工会证的匪徒”，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和家庭主妇中获得传奇般的称颂（129 页）。安那祺主义、或者因为被政府检阅叫自由主义 Libertarian⁶¹，成为工会以外的民众蜂起（如 Casas Vieja⁶²）的旗帜。

Abel Paz 称赞 Ascaso、杜鲁底、Oliver：“他们三人学会了巴枯宁的两个基本原则：对劳工阶级的创造能力的绝对信赖和建立革命组织的必要性”（148 页）。1933 年 1 月失败后，杜鲁底在狱中写下了他唯一发表过的文章，表明：“我们从没有认为革命可以由一小撮人夺权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我们的革命觉悟反对这种战术。我们的革命由民众完成、为民众服务，没有这个条件任何革命都是空想。除此之外的革命只不过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政变。我们来自工厂、矿山和农场，需要的是改变社会的革命，与布朗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关系。我们必须随时准备革命，但谁也不知道革命何时爆发”（149 页）。“任何战士都不应该在一个委员会里被任命的岗位上停留更长的期间。我们没有永久的任命，也没有不可取代的领导人”（155 页）。1936 年 2 月西班牙议会选举时，杜鲁底看得很清楚：“左翼宣言：如果右翼获胜，他们就要发起革命；右翼威胁：如果左翼获胜，他们就要发动内战。我们处在革命或内战的前夜，我们必须清楚地警告劳工阶级：投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问题只能在手持武

⁶¹ 原义更接近克鲁包特金的 Anarchist Communism，但后来被找不到自己概念表达的哈耶克等偷去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号。

⁶² 见笔者介绍的“卡莎维哈斯惨案”，2007 年 1 月 1 日。

装的街头解决”（154页）。CNT全国委员会1936年2月14日发布的宣言特别指出：“摩洛哥是谋叛的焦点”（155页）。此时，CNT有大约1百万名成员，FAI有496个小组、估计为5千名成员（178页）。正是他们帮助左翼（社会党和共和派）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又力挽狂澜拯救、誓死捍卫共和，写下了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历史和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对于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运动在内战期间决定加入政府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历史条件下违背安那祺主义原则的决定，安那祺主义者们至今依然没有定论（251页）。法国的著名安那祺主义者Faure当时就预言：“任何安那祺主义者与反对安那祺主义的政党的哪怕是暂时的合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欺骗，而安那祺主义者总是受害者。这已经被经验、历史和简单理性所证明。在哪怕是临时和短暂的合作中，安那祺主义者的忠诚和诚实总是被那些权威主义者伙伴们欺负和出卖”（204-205页）⁶³。历经镇压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当然知道这些，杜鲁底对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

记者发表的谈话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消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



⁶³ 每次读到安那祺主义的这一类教训，我脑海里总是一幕一幕地显现出1989年我们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在日本被出卖、迫害的景象：为什么自己那样幼稚无知呢？为什么总是不肯相信政治中“人性恶”的警告呢？但是，如果我们都“聪明”的话，就不会有人类文明的历史了。

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⁶⁴ 问题是：如果没有安那祺主义的支持，共和政府一天也维持不下去。那么，共和政府中的那些资产阶级共和派、加泰罗尼民族自治派、社会党人（“西班牙的列宁”Caballero）、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的代理）为什么要不惜输掉内战而利用、出卖甚至镇压安那祺主义者呢？可惜安那祺主义运动在4个月内就失去了无可取代的领袖：杜鲁底（插图中）1936年11月20日就牺牲在前线，而Ascaso（插图左）在第三天（1936年7月20日）扑灭叛乱的战斗中就牺牲了。



正如笔者在“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⁶⁵中总结的那样：“持续了将近3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的西班牙内战则是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国家社会主

⁶⁴ 此书206页。译文引用王凡西译自斐列克斯·莫罗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

⁶⁵ 2011年6月4日。所有引用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站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义政党和新起的共产党又合作又被出卖（内战中的内战）的过程中，被以弗朗哥为首的旧军队、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会和保皇党势力联合的血腥法西斯军事独裁击败和报复的悲剧。”其中的转折点就是1937年5月初在巴塞罗那发生的“内战中的内战”事件，它导致了具有独立和托洛茨基色彩的POUM的瓦解和它的领导人Nin被暗杀⁶⁶、社会党领导人Caballero政府的解散、CNT退出政府以及安那祺主义影响消退、加泰罗尼亚政府失去自治权力、共产党人Negrin的上台以及共产党在各级权力中夺权（209页）。虽然各派都害怕失去苏联的援助而不敢得罪西班牙共产党，但内战初期只有几千人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大权独揽呢？除了社会党无能抵抗、自身没有力量的加泰罗尼亚“总统”Companys想借用马德里政府打击加泰罗尼亚的唯一力量安那祺主义者外，安那祺主义者群龙无首、没有组织反抗是致命的失败。当时国防委员会还在CNT-FAI控制之下，它无动于衷（208页），可能它们同意要由中央政府、也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接管加泰罗尼亚政府。国防委员会的书记Molina曾经是FAI的书记，他竟然拒绝了广大CNT战士的请求，不肯把Huesca战线的安那祺主义者纵队调回巴塞罗那（212页）。又据FAI老会员、当时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委员de Santillan回忆，当遭到Companys一个班威胁时，他打电话给安那祺主义者控制下的炮兵连，命令他们随时准备好向Companys的自治政府开炮（211页）。“我们有能力回到瓦伦西亚、拒绝承认对Pozas将军和他的军官的任命，我们也能阻止Torres上

⁶⁶ 乔治·奥威尔偶然加入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POUM(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联合党)组织的民兵，被派到安那祺主义民兵战斗的阿拉贡战线。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译者李华，刘锦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已经成为经典记述。见笔者对此书的摘录（主要为关于安那祺主义的部分，校注根据Orwell in Spain. Ed. Peter Davison, Penguin Books, 2001，与原译文所用的版本不同，在一些政治用语、意义和重要的意思表述上改动较多。同时简略参照由Lionel Trilling作序的1952年New York的Harcourt, Brace & World公司出版的版本）。

校带领的武装卫队和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运动的领导者们缺乏自信，我们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在危机时保持我们的地位”（212页）。“除了退缩和惰性，我们运动的代表们经历了蜕变。他们反映了那时的组织结构所受的、从来没有渗透到我们的运动的精神状态的影响”（213页）。“这是 CNT-FAI 能够改变内战和革命时期的重要战略事件，但他们的领导人们缺乏实施这个战略的勇气”（211页）。“CNT 和 FAI 靠适应环境残存下来，但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品格和定位，它们无法不去支持反对革命的政府，也就失去了一切”（214页）。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完全失去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以及失却了整个内战”（211页）。

当然，正如安那祺主义第一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必然面临失败的悲剧一样⁶⁷，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近代史上的悲壮牺牲⁶⁸，正是为人类背负的政治十字架，启示了我们可以选择人类从来尝试过的基于自发良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

[2014年4月19日]

⁶⁷ 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所有引用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站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⁶⁸ 从国际政治的环境看，英国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可以与忠于共和的西班牙海军阻止叛军从摩洛哥运输到西班牙。葡萄牙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但英国得到佛朗哥承认英国在葡萄牙利益的保证。为了避免与德国冲突，英国也威胁想要资助西班牙的法国：如果德国为西班牙参战而与法国交战，英国将不履行同盟义务保护法国。美国也受英国的态度影响，默许它的公司向佛朗哥出售武器。

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纲领⁶⁹

马克思主义统一问题

不幸，革命所需要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在西班牙还不存在……

西班牙共产党并非我们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它服从于苏联国家的外交政策，它不得不根据常自相矛盾的苏联外交而行动，而非根据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作为“工农联盟”⁷⁰同共产主义左翼联合的产儿，坚信：让一个现存政党囊括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问题并非在于“打入”或“吸收”，而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通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建立一个新的党，是必要的。

工人党⁷¹坚信，完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一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西班牙革命是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面对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不能和平取得政权，而需要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第二：一旦取得政权，应当实行作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机构应当是工人联合会。无产阶级专政预示着全面、完全的工人民主。革命政党不应当也不能窒息这一民主。

第三：对工人联合会的需要既是地方的，也是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必须通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领导防御和进攻以及合法和非法

⁶⁹ 首次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谁？他们想要什么？》，巴塞罗那，1936年版，第7至9页。该纲领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实践不完全吻合。

⁷⁰ 西班牙一个政治组织。

⁷¹ 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行动的统一阵线的机构；第二阶段，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第三阶段，作为政权机构。

第四：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西班牙应成为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第五：首先应当民主解决土地问题。土地归耕者！

第六：面对战争，应当将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国内战争。不对国联这一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抱希望。

第七：统一了的党应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外——两者均已破产。应为新基础上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联合而斗争。

第八：通过国际工人阶级的行动保卫苏联——而非促使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条约的政策。

第九：在统一了的党内应长期实行民主集中制。

2. 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纲领⁷²

托洛茨基主义者想要什么？

1. 用唯一有效的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击败法西斯主义。通过剥夺原剥夺者和全面打碎旧国家机器来消灭法西斯主义及其繁荣的根源——资本主义民主的腐臭土地。在过渡时期，我们要求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残余作斗争——资产阶级残余借助国际资本主义妄想重新建立私有制及资产阶级政权。这一尝试的最好例子就是当前资产阶级的欺骗伎俩——尤其是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无产阶级专政会真正实行工人民主，因为财产的特权会消失，而且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2. 只要无产阶级还没能夺取政权，我们就会保卫工人在资本主义暂时政权的框架中的民主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地——也不带任何政治欺骗——要求全国劳工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结成[工人]斗争的统一阵线。我们绝不允许阶级敌人破坏工人自己的组织，即使当我们的政治对手提出这样的要求。昨天，我们要求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今天，我们抗议把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排挤出人民法庭；明天，武器在手，我们将保卫全国劳工联盟。我们过去是，而且将继续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热烈支持者。

3. 我们支持建立起工人、农民、士兵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当是由每一工厂、每一村庄、每一连队民主选举产生。可根据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换苏维埃的代表。这样的委员会已在七月⁷³形成。群众的真实要求是，承认他们尽可能自由的权利。这样的委员会将会服

⁷² 英译本根据C.L.R.詹姆士的《斗争》（Fight）月刊重印。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即第四国际支部）仅有8人。

⁷³ 指1936年7月。

务于群众的任务——保卫革命成果，维持社会治安，管理经济与分配。每一个[委员会里面的]党都可提出自己的提案，让群众来决定[采取哪种提案]。

4. 我们反对那个所谓的“人民阵线”政府——实际上，这个政府并未代表绝大多数人民。我们反对阶级合作，因为这是包办替代工人阶级的陷阱。这样一个政府中的妥协只能导致彻底的背叛。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每一处都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召开全西工农兵委员会代表大会，从各地工农兵委员会的代表中选举出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只有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才不会背叛，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

5. 我们的目标是完全剥夺资本家。到目前为止，银行尚未被触及，交换方式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控制之下。我们坚决拒绝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要求的“自治”，“自治”实际上从工会手中夺取企业，使企业处于反动政府的控制下。我们的口号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实行完全社会化，建立对外垄断贸易。

6. 我们要求土地国有，即废除私人土地所有制。高利贷者不能再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了。我们支持农民自愿的集体化。土地的分配必须由农民委员会根据下述原则进行：“土地归耕者”。

7. 我们坚信，只有在统一指挥之下的集中的军队，才能确保军事胜利，但军队必须是一支士兵有民主权利的革命军队，所有人员的薪金相等。军队应由革命委员会下的战争委员会统一指挥。这样一支军队中，士兵的积极性和革命警惕性会弥补物质和技术方面的不足。这将成为一支常胜军。

8. 我们支持少数民族自决权，支持摩洛哥人民的绝对自由，包括其分离的自由，摩洛哥应归摩洛哥人！这样的口号一经公开宣布，将[实际上]鼓动被压迫的摩洛哥人民起义，从而使法西斯雇佣军崩溃。我们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邦，因为这最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它将由所有自由的、兄弟般团结的工人自愿组成。

9. 我们与斯大林主义官僚进行斗争，他们自称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在全世界——包括西班牙——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世界革命和在全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胜利不被官僚集团——就像苏联官僚集团那样——所篡夺。我们反对由第三国际人民委员和第二国际资产阶级部长所实践的“不干涉”政策。我们要求革命的无产阶级干涉，并将西班牙革命转化为欧洲革命。

10. 旧组织已经带我们走到死胡同了。深信着将战胜所有法西斯匪帮和依赖“有力领导”的整个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我们将集中力量建立起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适应这一任务。它的牢固基石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列宁、托洛茨基继承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可耻背叛后，我们将在一个新的第四国际——一个世界的社会革命政党——中再次集合所有坚定的革命者。在它的未被玷污的旗帜之下，社会主义将取得胜利！同志们！我们知道，首要任务是击溃佛朗哥。但是你，像我们一样，了解军事胜利和社会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公开地，不带政治欺骗地反对那个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政策。社会革命的深入，不但不会削弱战壕里的统一阵线，还会加强我们民兵的战斗精神。我们希望让1936年7月精神重生！

用战斗岁月的热情，和今天的武装和经验，我们要在一个挣脱了资本主义枷锁的社会主义西班牙庆祝1936年7月！

.....

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第四国际）

巴塞罗那，1937年7月19日

3.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摘录）

[英] 乔治·奥威尔⁷⁴

[第 1 章]

几乎所有的大小建筑都被工人们占领，并悬挂着红旗或安那祺主义者的红-黑旗；每面墙上都潦草地涂写着锤子和镰刀的标志，以及各革命政党的首字母缩写；几乎每座教堂都被摧毁，圣像都被焚毁。到处都有教堂被工人们系统地拆除。每家商店和咖啡馆都刻有已集体化的字样；甚至连擦鞋匠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包厢也被漆成了红-黑色。服务员和商店职员直视着你的脸，平等地对待你。卑躬屈膝的甚至礼节性的言语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大、老）或者‘*Don*’（先生、老爷）、甚至‘*Usted*’（您）；每个人都称呼别人为“同志”和“你”，用“*Salud*（健康）！”而不是“*Buenos días*（早上好）”。自 *Primo de Rivera* 的时候开始，法律就禁止给小费；我几乎第一次遇到小费，就是因为想给电梯员小费而被酒店经理训斥。没有私家车，它们都被征用了，所有的电车、出租车和许多其他交通工具都漆成了红-黑色。革命海报随处可见，墙上挂满了鲜艳的红

⁷⁴ <https://gutenberg.net.au/ebooks02/0201111.txt> Project. Title: *Homage to Catalonia* (1938), eBook No.: 0201111.txt. Edition: 1, Date first posted: December 2002, Date most recently updated: February 2020. 奥威尔偶然加入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 POUM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联合党) 组织的民兵，被派到安那祺主义民兵战斗的阿拉贡战线。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文译者李华，刘锦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引自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homeagetocatalonia.htm>。汉译作为报告文学文笔流畅，值得推荐。我在2015年1月25日第5版摘录关于安那祺主义的部分，校注根据 *Orwell in Spain*. Ed. Peter Davison, Penguin Books, 2001，与原中文译文所用的版本不同，在一些政治用语、意义和重要的意思表述上改动较多。我同时简略参照由 Lionel Trilling 作序的1952年 New York 的 Harcourt, Brace & World 公司出版的版本。这个版本更强调“共产党的出卖”。由于无法联系到原译者，担心存在“版权”的分歧，我在第6版根据 Project Gutenberg of Australia 英文重新摘译少量部分内容。

蓝相间的海报，这使得仅存的几张旧日广告看起来像是一堆泥巴。沿着 Ramblas 大街，这座城市宽阔的中心干道，人群熙熙攘攘，喇叭里整天都在播放革命歌曲，直到深夜。而最奇怪的，正是人群的样子。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富裕阶层几乎不复存在的城镇。除了少数妇女和外国人外，根本没有“衣冠楚楚”的人。几乎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人阶级服装，或者蓝色工装裤，或者某种民兵制服。这一切都既古怪又感人。其中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在某些方面我甚至不喜欢，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状态。我也相信，事情就是这样，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人国家，所有资产阶级要么逃走了，要么被杀了，要么自愿投奔工人一方；我没有意识到，许多富裕的资产阶级只是暂时躲了起来，伪装成无产阶级。

[第 5 章]

安那祺主义者们的观点不太容易定义。无论如何，“安那祺主义者”这个宽泛的术语被用来涵盖众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组成 CNT/全国劳工联盟的庞大工会集团，共有约两百万成员，其政治机构是 FAI/伊比利亚安那祺主义联盟，这是一个真正的安那祺主义组织。但即使是 FAI 的成员，尽管像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始终带有安那祺主义哲学的色彩，也未必是纯粹意义上的安那祺主义者。尤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更倾向于普通的社会主义，因为形势迫使他们参与中央集权管理，甚至违背所有原则进入政府。然而，他们与共产党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 POUM/马统工党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工人控制，而不是议会民主。他们接受了 POUM 的口号：“战争与革命密不可分”，尽管他们对此没有那么教条。粗略地说，CNT-FAI 主张：（1）由各行业的工人直接控制工业，例如运输业、纺织厂等；（2）由地方委员会治理，抵制一切形式的中央集权专制；（3）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教会。最后一点虽然不太明确，但却是最重要的。安那祺主义者与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者截然相反，尽管他们的原则比较模糊，但他们对

特权和不公正的憎恨却是真诚的。从哲学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和安那祺主义截然相反。从实践角度来看——即在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上——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侧重点，但这种差异却难以调和。共产主义始终强调集中和效率，而安那祺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并且很可能在俄罗斯影响力消退后比共产主义更长久地存在。在战争的头两个月里，安那祺主义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挽救局势，而在此之后很久，安那祺主义民兵们尽管纪律松散，却以西班牙本土部队中最优秀的战士而闻名。大约从 1937 年 2 月起，安那祺主义者和 POUM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一类。如果安那祺主义者、POUM 和社会党左翼一开始就明智地联合起来，推行一项现实的政策，战争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在战争初期，当革命党派似乎掌控着局势时，这是不可能的。安那祺主义者和社会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嫉妒，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POUM 对安那祺主义者持怀疑态度，而从纯粹的安那祺主义立场来看，POUM 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比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好多少。然而，共产党的策略却倾向于将两党推到一起。当 POUM 在五月加入巴塞罗那那场灾难性的战斗时，主要是出于本能地支持 CNT，后来，当 POUM……被镇压后，安那祺主义者是唯一敢于站出来为它打抱不平的人。

[第 6 章]

天主教会 对西班牙人民，至少对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人民来说，纯粹就是一场骗局。基督教信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安那祺主义所取代。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 Anarchism

《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 The Chicago Haymarket Anarchists

《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 马赫诺运动、喀琅施塔得起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问题

